

圓融二諦

——梁武帝思想研究

李曉虹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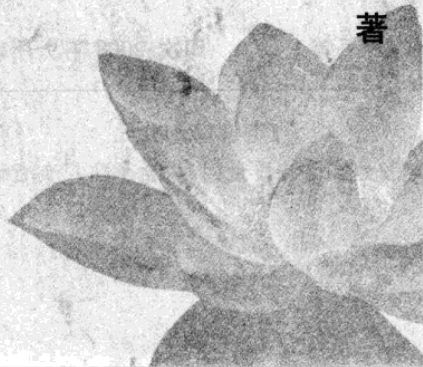


圓融二諦

——
梁武帝思想研究

李曉虹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圆融二帝:梁武帝思想研究/李晓虹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48-2821-8

I. 圆… II. 李… III. 梁武帝-思想评论 IV. K827=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6831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智丰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4.875

字数:295 千字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听到李晓虹的博士论文《圆融二帝——梁武帝思想研究》即将正式出版，为她感到高兴，也为梁武帝研究又将有新成果问世而感到欣喜。

梁武帝作为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他所处的时代，政治上南北分裂，但人们又向往着统一；文化上儒、佛、道多元冲突，同时也加深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梁武帝本人的一生，也可谓是跌宕起伏，既“开国”当上皇帝，又“亡国”而饿死台城，因而对他一生的评价，也是历来争议不断，褒贬不一。有的称赞其：“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①有的则批评他“帝溺情内教，朝政纵弛”^②，“留心俎豆，忘情

① 【唐】姚思廉：《梁书》第3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页。

② 《郭祖深传》，载【唐】李延寿撰：《南史》第70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0页。

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乎！”^①

如果说对梁武帝作为帝王的行为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对他在文化学术方面的作为则肯定的比较多。确实，据《梁书·武帝纪》和《隋书·经籍志》等记载，梁武帝一生在儒学、佛学、道学、经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著述，还主持编撰了儒家经典的注疏，曾著有《孔子正言》、《老子讲疏》、《中庸讲疏》、《通史》、《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礼记大义》等诸多著作，“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②。

对于梁武帝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曾留下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系统全面研究其思想的著作更没有出现。可喜的是，李晓虹的博士论文以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背景对梁武帝的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弥补了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① 《南史》第7卷，第225~226页。

② 《梁书》第3卷，第96页。又，《南史》有同样的记载，梁武帝“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或遇事拥，日恍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南史》第7卷，第223页）。

李晓虹的博士论文并没有对梁武帝的生平事迹花过多的笔墨，而是把研究的重心落实在他的“思想”。犹如匡亚明先生所说的：“历史上各个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其思想既可以是体现在其论著中，也可以是凝聚在其业绩和事功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而梁武帝作为一个帝王，不仅通过一定的事功表现出了他的“思想”，而且他还有许多专门的著述，对儒、佛、道都有一定的研究，更在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既冲突又融合这样一种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背景下提出了富有特色的“三教同源”说，值得很好地研究。我本人近年来在研究中国佛教的同时也一直在研究儒、佛、道三教关系，深感梁武帝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的“三教同源”说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思想内涵对了解这段时间的思想文化史、佛教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李晓虹博士的论文选取“三教关系”这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对梁武帝的“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并以此来审视梁武帝的思想特点和评价他的历史地位时，我感到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李晓虹博士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她本人细心地从《敦煌宝藏》和《藏外道书》中新发现的一些有关梁武帝的原始资料，既参考了前人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不囿于前人的成见，结合梁武帝的整体思想，抱着对梁武帝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努力写出了自己的新意，并尽量不使自己的分析评价有失偏颇。

李晓虹博士内秀外慧、娴淑文静，在学习和研究方面十分认真刻苦、坚韧执著。入学以后，她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撰写博士论文，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修改。在她撰写和修改论文的最后一年，我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幸好现在通信方便，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很方便地经常联系。记得2005年2月2日我就收到了她全部初稿的电子版，提出修改意见以后，3月21日又收到了她修改后的第二稿，再次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后，5月3日又收到了她的第三稿，这时已经基本定稿，但其后仍然又作了一些小修改，于5月11日才最终定稿付印。论文从初稿到定稿，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凡是我提出的问题，她都认真思考、反复推敲、细心修改。她的有些观点，其实我并不完全同意，特别是在对梁武帝的评价方面。互相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她都作了修改，但也有一些依然有所坚持。这种既尊敬老师，又尊重学术的态度，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而又严谨的认真态度，李晓虹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成功，论文颇多创新之处，对此她自己在文中作了概括，论文答辩委员会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论文以全优的评价而获得一致通过即是最好的说明。对此，我不再多说，相信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评价。我这里想说的是，做学问，就要认真踏实，甘坐冷板凳。李晓虹博士凭着这种精神，获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相信她凭着这种精神，在未来的教学与科研中一定能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我期待着。

是为序。

洪修平

2006年12月18日完稿于北京会议期间

绪论

魏晋南北朝（220～589年）是秦汉大一统帝国崩溃瓦解之后战争频仍、朝代迭更的动乱时代。从公元220年曹魏当政到公元581年隋文帝建隋，先后出现了二十几个政权。永嘉之乱（307～312年）以后，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胡人统治时代，各地豪族成为胡汉复合社会的中流砥柱；南方则大批士族过江，共拥东晋元帝建立朝廷而偏安江南。因此，南北的统一与政治的安定，似乎成为这一时代中所有有理想的政治人物之热望。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化冲突融合、民族交往密切的时期。当时北方一方面有笃信道教的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对佛教展开的激烈、残酷的灭佛法难，另一方面也有崇信佛教的帝王建造的扬名后世的云冈石窟及龙门石窟中慈祥、雄伟的“帝王如来身”大石佛；南朝一方面有本土儒、道两家与外来佛教所展开的势不两立的形神、因果、夷夏、本末等激烈的义理论争，另一方面也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共存等兼容

性、创造性的理念或政策出现，^①两晋南北朝时期，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②而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调适期，逐渐在中土站稳了脚步，并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影响士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儒、道两家在与佛教的辩难、论争过程中，针对佛教存在的问题展开发难的同时，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学说主张，吸取佛教精华，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儒学人士在经过两汉烦琐的章句训诂过程之后，受佛教心性义理思想和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意识到两汉儒学对心性义理层面的缺若，逐渐突破传统烦琐的章句训诂之学、走出讖纬神学，向民间和心性之学发展，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规范，为隋唐、宋明儒学摆脱章句训诂的窠臼、形成心性义理之学的兴盛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道教也吸取佛教思想精华，把养生修道以求肉体长生不老的修行宗旨转向了追求精神上的永存。儒、释、道三教的相互调适与交融，也促成了隋唐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

同时，这也是一个让时人深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苦难时代。身处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期，人们纷纷在儒、释、道三教之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息心养性之所。锐意儒学，积极进取，以求济世救民者有之；归身道教，炼气养生，以求

^① 参见颜尚文著：《梁武帝》，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初版，第1~13页。

^② 参见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86页。

长生不老、肉体成仙者有之；遁入空门，青灯古佛，以求涅槃解脱、进驻极乐者有之；淡然世事，纵情丘壑，不以俗物挂心者有之。而随着对儒、释、道三教理解的逐渐深入，多有名流雅士乃至一般民众兼奉三教，各取所长，以求在乱世之中找到一精神寄托和心灵诉求之所。

动荡的社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苦难的同时，从侧面也促成了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深入，也给各种思想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突破自身的局限、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所以，这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两汉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说、各种言论，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到裴頠的崇有论，到郭象的独化论，再到东晋南朝的玄释交融；从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再到东晋南朝的玄礼兼重、“名教”与“自然”合一；从六朝前期支谦、康僧会、竺法雅的格义佛教，到六朝般若学的繁盛，再到涅槃学竺道生“阐提有性”、顿悟成佛说的提出；从葛洪对神仙道教的总结和阐发，到寇谦之、陆修静对道教的改革，再到陶弘景集六朝道教之大成。其间虽因政局的跌宕和为政者的宗教信仰、政策导向的不同而荣枯不一，但却没有一家独尊，每一种学说都大放异彩，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南朝萧梁政权时期，儒学“济济焉，洋

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①，“固东汉以下未有之盛也”^②；佛教则“家家斋戒，人人礼忏”^③，“国内普持六斋，兆民皆受八戒”^④。道教虽然没有达到像佛教那样的盛况，但是我们从梁朝对“山中宰相”陶弘景礼遇的态度也可见一斑。

梁武帝萧衍便是生活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种历史时空的帝王。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南朝梁代的开国帝王，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502～549年）。作为帝王，梁武帝不仅是一位勤于政务、多所创制、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期间，进行了礼制、律制等诸多改革；同时也是一位洞达儒玄，博通前载的学者，曾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中庸讲疏》、《通史》、《周易讲疏》、《尚书大义》、《礼记大义》等诸多著作；此外，他还是一位融合儒、释、道三教的佛教教徒，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背景下提出“三教同源”的主张。其在位期间，政治承平、文风大盛，南朝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正如《梁书》史臣所说：梁武帝即位之后，“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

① 【唐】姚思廉：《梁书》第48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62页。

②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7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页。

③ 《郭祖深传》，载【唐】李延寿撰：《南史》第70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21页。

④ 《法苑珠林》第100卷，载《大正藏》第53卷，第1025页中。

征赋所及之乡，文轨旁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环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馾角阙庭。三四十年来，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①。《南史》史臣亦赞曰：“及（梁武帝）据图策，多历年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②虽然梁武帝最终没能结束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实现大一统的愿望，但在其在前三四十年来，无论是文化、经济、社会，还是疆域，都达到了魏晋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广大。在南北朝对峙而长期战乱不已的形势下，以梁朝的覆亡为转折点，标示着南北军事上的均势从此消失，因而大致决定了四十年后隋朝统一南北的局面。^③由此可知，作为帝王，梁武帝在魏晋南北朝下启隋唐帝国的历史趋势上居于颇为关键性的地位，作为融贯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学者，梁武帝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此，我们不由自主地反问，作为一个以信奉佛教而闻名的帝王，梁武帝为什么能够在虔诚地信仰佛教的同时，扶植儒学，善待道教，提出“三教同源”的主张，使儒、释、道三教在梁朝形成了各自的繁荣局面，而没有走上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而灭绝佛教的极端之路？而“性至孝”、以儒家修齐治平的修养模式要求自己的梁武帝又为什么会历史性地提出给佛教

① 《梁书》第3卷，第97页。

② 《南史》第7卷，第225~226页。

③ 详见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周一良集》第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带来深远影响的“素食戒荤”制度并躬受菩萨戒、在全国推行菩萨戒，以致有“皇帝菩萨”的称号？梁朝何以能在魏晋南北朝长达三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中取得如此的盛世局面呢？梁朝的统治者梁武帝又是如何使梁朝达到这种盛世局面的呢？梁武帝究竟是否如正统史臣所说的那样因“溺于释教”而导致身死国亡？

又如颜尚文所说，梁武帝究竟是一位极端的现实政权追逐者抑或是一位“罔恤民命”的昏君？还是一个极端理想的宗教牺牲者，一位神圣的“皇帝菩萨”？而梁武帝个人能否超越中国封建君主集权体制以及三百年来六朝贵族门阀的束缚，抛弃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照顾身份卑下的庶民奴婢？是否能不动干戈而力挽其政权、国家免于沦亡的宿命？^①

人总是现实中的人，而人与其他物类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人能够反思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加以理性化、抽象化，使之形成人类共通的知识 and 生存经验。面对外来文化——佛教，梁武帝在对佛教痴迷的同时并没有迷失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倡扬和发掘，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与重铸，形成了梁武帝自己的会通中外、融贯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体系。梁武帝在其本有的形上哲学的预设下，企图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践履儒家自家刑国、内圣外王之道，实现其人间净土的理想，结果虽然使梁朝取得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各方面

^① 颜尚文：《梁武帝·自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初版，第2~3页。

自魏晋以来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自己晚年却落得身陷贼手、饿死台城、国破家亡的悲剧。对此，后世论者把梁朝的灭亡，或归于佞佛而劳民伤财，或归于宠勋太过、御下太宽，或归于治民严苛、忽略治术，或归于委任小人、疏简刑法。我们究竟该如何论断梁武帝呢？

笔者怀着诸多的困惑走进梁武帝的历史时空。目前关于梁武帝思想，尤其是梁武帝儒、释、道三教思想系统全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几乎近于空白，也正因此，笔者选择《梁武帝思想研究——以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关系为背景》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就已有的关于梁武帝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海外研究梁武帝的专门著作主要有日本的森三树三郎的《梁武帝——佛教王朝的悲剧》^①，台湾颜尚文的《梁武帝》^②，这两本著作主要是研究梁武帝佛教思想所由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并没有全面研究其思想本身，尤其是梁武帝的儒学及道家道教思想。颜尚文先生《梁武帝》一书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探讨梁武帝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及“皇帝菩萨”理念形成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执行情形，其研究范围“限于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与‘佛教国家’兴灭，其重点在于与本题有关梁武帝的政治、佛教之交互关系，而与此主题关系比较疏远的梁武帝政

① (日) 森三树三郎：《梁の武帝——佛教王朝の悲剧》，京都：平乐寺书店，1985年版。

② 颜尚文：《梁武帝》，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初版。

治思想、制度或佛教思想、信仰、制度等方面则不予讨论”^①。

国内关于梁武帝的著作有张慧诚的《梁武帝萧衍传》^②和曹道衡、傅刚的《萧统评传》^③，其中关于梁武帝家世的叙述，前者主要从文学的角度以小说的形式叙述梁武帝由创业建国到身死国灭的动态过程，对其学术思想仅一笔带过；后者对梁武帝的思想本身也罕有论及。

关于研究文章，日本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梁武帝的佛教思想，主要的有内藤龙雄《梁武帝与“般若经”》^④、安藤圆秀的《梁武帝之佛教》^⑤等，颜尚文有《梁武帝注解〈大品涅槃经〉与“佛教国家”的建立》^⑥、《梁武帝“皇帝菩萨”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⑦、《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⑧、《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

① 《梁武帝·前言》，第9页。

② 张慧诚：《梁武帝萧衍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日)内藤龙雄：《梁の武帝と“般若经”》，载《印度学佛教研究》第22卷第1期(1973年)。

⑤ (日)安藤圆秀：《梁武帝の佛教》，载《东亚研究》第3卷第4期(1913年)。

⑥ 颜尚文：《梁武帝注解〈大品涅槃经〉与“佛教国家”的建立》，载《佛学研究中心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128页。

⑦ 颜尚文：《梁武帝“皇帝菩萨”理念形成的时代背景》，载《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第123~164页。

⑧ 颜尚文：《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载《东方宗教研究》（新一期），1990年10月，第41~90页。

策之形成基础》^①，洪顺隆《梁武帝诗赋中的“儒佛会通”》，龚显宗《从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萨》^②。国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③一书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中有《梁武帝》、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诸说中有《梁武帝》、第十八章南朝成实论之流行与般若三论之复兴中有《周颙梁武与摄山僧》，周一良《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④中有《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一文，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⑤一书中有《梁武帝萧衍与佛教》一文，曹道衡《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⑥，孙述圻在《六朝思想史》^⑦中关于菩提达摩与梁武帝关系的论述等，这些文章主要也是论述梁武帝佛教思想及其时代背景。潘桂明《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⑧

① 颜尚文：《梁武帝“皇帝菩萨”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载《师大历史学报》1989年第17期，第1~58页。

② 龚显宗：《从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萨》，载《普门学报》第8期，第230~240页。

③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载《汤用彤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④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载《周一良集》（第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

⑥ 曹道衡：《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载《齐鲁学刊》（曲阜）2001年第1期，第45~54页。

⑦ 孙述圻：《六朝思想史》，南京出版社，1992年版。

⑧ 潘桂明先生《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一文原载《寒山寺佛学》，此文内容也反映在潘先生《中国居士佛教史》一书中，因此，本文在参考潘先生关于梁武帝的论述时以《中国居士佛教史》一书为主。

一文对梁武帝的儒、释、道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论述，但也不是系统地对其进行论述，并且其所运用的资料亦是一般所常见的资料，对《敦煌宝藏》和《藏外道书》中保存的梁武帝的原始资料未能运用。总的来说，目前关于梁武帝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 主要是从史学的角度对梁武帝佛学思想的研究，并且主要是分析其以佛治国，没有对其思想及其哲学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很少有人重视梁武帝的儒学思想及其在儒学中应有的地位，比如梁武帝对三礼的损益、对《四书》之一的《中庸》的重视、对儒学心性思想的论述等。

2. 目前研究者关于梁武帝的研究主要是依据《全梁文》、《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弘明集》等资料，笔者在爬梳《敦煌宝藏》和《藏外道书》等文献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梁武帝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是国外内学者研究成果中所未见用的。颜尚文先生在《梁武帝》一书中虽然运用了《敦煌宝藏》中梁武帝的原始资料《出家人重受菩萨戒法》，但是，如其本人所说，其侧重点不在梁武帝的思想本身，并且对《敦煌宝藏》中梁武帝的其他资料并未注意。

从史学的角度，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背景本身寻找梁朝灭亡的原因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本身往往容易忽略思想史和哲学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且历史人物本身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也容易被忽略。因此，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背景下，从梁武帝的思想本身入手，厘清梁武帝思想本身的脉络和逻辑层次，揭示其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逻辑地